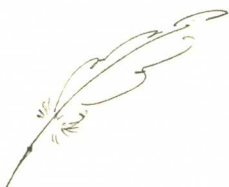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美] 朗佩特 Laurence Lampert ● 著

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卡尔米德》以及《王制》绎读

How Philosophy Became Socratic:
A Study of Plato's *Protagoras*, *Charmides*, and *Republic*

戴晓光 彭磊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卡尔米德》以及《王制》绎读

How Philosophy Became Socratic:

A Study of Plato's *Protagoras*, *Charmides*, and *Republic*

[美] 朗佩特 Laurence Lampert | 著

戴晓光 彭磊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卡尔米德》以及《王制》绎读 / (美) 朗佩特著; 戴晓光、彭磊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 1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How philosophy became socratic: A Study of Plato's Protagoras, Charmides, and Republic

ISBN 978-7-5080-8280-6

I. ①哲… II. ①朗… ②戴… ③彭… III. ①苏格拉底 (前469~前399)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6640 号

How Philosophy Became Socratic: A Study of Plato's *Protagoras*, *Charmides*, and *Republic*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2010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5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5878 号

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

著者 (美) 朗佩特
译者 戴晓光、彭磊 等
责任编辑 马涛红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6.5
字 数 400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 工程”支持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εράσ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以及Erich Loewenthal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

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 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 译）
- 3 克力同（程志敏 译）
- 4 蒲法伊东（刘小枫 译）

卷二

- 1 克拉提洛斯（刘振 译）
- 2 泰阿泰德（贾冬阳 译）
- 3 智术师（柯常咏 译）
- 4 治邦者（张爽 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 译）
- 2 蒲斐勒布（李致远 译）
- 3 会饮（刘小枫 译）
- 4 蒲法伊德若（刘小枫 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 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 译）
- 3 希普帕库斯（胡稼 译）
- 4 情敌（吴明波 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刘振 译）
- 2 卡尔米德（彭磊 译）
- 3 拉克斯（罗峰 译）
- 4 吕西斯（黄群 译）

卷六

- 1 欧绪德谟（万昊 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 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 译）
- 4 美诺（郭振华 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王江涛 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王江涛 译）
- 3 伊翁（王双洪 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李向利 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纓 译）
- 2 王制（史毅仁 译）
- 3 蒂迈欧（叶然 译）
- 4 克里提阿（叶然 译）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 译）
- 2 法义（林志猛 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崔嵬 编译）
- 4 书简（彭磊 译）

杂篇（唐敏 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如何凭靠尼采的眼光识读柏拉图

刘小枫

朗佩特(1941—)以尼采研究著称,直到《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2010)问世之前,他的著述的书名都没有离开过尼采。^①当坊间预告朗佩特将要出版一部柏拉图研究专著时,人们自然会期待看到他不同凡响的柏拉图识读功夫。如今,朗佩特的柏拉图研究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作者仍然以尼采为主题,亦即从尼采的视角来识读柏拉图。用朗佩特自己的话说,“在本书中,即使不常提起尼采的名字,他仍然无处不在”(页16,[引按]指英文版页码,即中译本编码,下同)。

《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分三个部分,依次识读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卡尔米德》和《王制》——首尾有“导言”和“结语”。“导言”虽然谈的是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是如何成为苏格拉底的”这样一个贯穿全书的问题,却以谈论尼采结尾。在“结语”部分,作者几乎完全在谈尼采——可以说,尼采问题框住了朗佩特的这部柏拉图专著。

从尼采的视角来识读柏拉图,可以恰切地理解柏拉图吗?或者说,我们应该凭靠尼采的目光来识读柏拉图吗?朗佩特的要求不难理解,毕竟,今人在思想上越长越矮,我们要理解古代高人,就得凭靠离我们

^① 朗佩特早年有《尼采的教诲:〈扎拉图斯特拉〉译读》(1986,姜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和《尼采与现时代》(1993,李致远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然后有《施特劳斯与尼采》(1996,田立年、贺志刚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随后是《尼采的使命:〈善恶的彼岸〉译读》(2001,李致远等译,华夏出版社,2010)。

较近的长得高的今人。不仅如此,这个长得高的今人还得有一个大抱负:致力于理解自身的文明思想传统及其面临的危机——否则,柏拉图与我们有何相干。可以肯定,尼采就是这样的长得高的近人——而且离我们很近,他对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现代危机的理解,无人能出其右。

如果应该从尼采的视角来识读柏拉图,首先就得恰切地把握尼采的视角——如所周知,要做到这一点,绝非等闲之辈。尼采离世一百多年来,论说尼采者何其多,不着边际或不得要领的论说又何其多。海德格尔的两卷本《尼采》代表着二十世纪理解尼采的最高哲学成就,^①但海德格尔是否恰切地理解了尼采,仍是问题。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让人们看到,尼采是个反柏拉图主义者,激烈抨击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要他为西方文明陷入虚无主义危机负根本责任。海德格尔敏锐地看到,尼采固然反柏拉图主义,但他反对柏拉图主义的方式——即建构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却使得自己成了柏拉图主义的最终完成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尼采把柏拉图主义“倒转”过来:

在这样一种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中,依然保留着一个与柏拉图主义共同的、被认为不言自明的信念:真理,亦即真实存在者,必须通过认识途径而获得保证。(海德格尔,《尼采》,前揭,上册,页177)

基于对尼采如此深透的理解,海德格尔才对自己的抱负充满信心:彻底克服或终结祸害西方文明思想两千多年的柏拉图主义。我们看到,经过尼采的“反柏拉图主义”和海德格尔反“尼采的柏拉图主义”,后现代哲人们得以开始放心大胆且自信满满地随意摆弄两千多年的西方文明传统。

朗佩特的眼力与此不同,他在自己早年的《尼采与现时代》一书中就已经提出:尼采开创了一部新的西方哲学史——这意味着开创了一种理解西方古代甚至历代哲人的眼光。朗佩特宣称,眼下这部长达四百多页的柏拉图研究专著属于尼采所开创的新哲学史的“开端部分”。他提出的问题是:“柏拉图何以是一位尼采意义上的真正哲人”(楷体

① 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重点均为引者所加,下同)。这个问题的表述让人吃惊:尼采的眼光成了衡量古人柏拉图甚至“真正的哲人”苏格拉底的尺度。朗佩特说,尼采的衡量尺度是:伟大的哲人们是“命令者和立法者”。然而,这一衡量尺度不恰恰来自柏拉图吗?伟大的哲人们是“命令者和立法者”——这话难道不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最先说,而非尼采最先说?倘若如此,朗佩特为何要而且公然敢倒过来说?为什么他不问:“尼采何以是一位柏拉图意义上的真正哲人”?

在海德格尔眼里,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位走上歧途的形而上学家,^①尼采算得上最后一位;在朗佩特眼里,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位政治哲人苏格拉底的学生,尼采是最后一位——苏格拉底在海德格尔的哲学史谱系中没有位置。对我们来说,问题来了:尼采究竟是形而上学家,还是政治哲人?无论是哪种情形,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尼采的“反柏拉图主义”:在尼采眼里,所谓“柏拉图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

朗佩特在“导言”中承诺,他要展示的“柏拉图是尼采所还原的柏拉图,是西方文明的奠基性教师,而西方文明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文明”。这无异于说,一个真实的柏拉图被西方文明掩盖了两千多年,而这种掩盖恰恰是柏拉图自己有意为之的结果:柏拉图式的文明掩盖了柏拉图自己的本来面目——这话让人听起来即便不吊诡,也让人费解:

在尼采看来,西方文明经过漫长、缓慢的增长,最终以各种“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的各种无神论衍生物,也即现时代——而达到顶峰。在对现代虚无主义的解剖——也即尼采“为接下来两个世纪所写的哲学史”中,尼采追溯了柏拉图式文明的漫长、缓慢的死亡。尼采在很远处透出自己的扎拉图斯特拉,将之作为后柏拉图式的可能继承者。(页13)

朗佩特用“柏拉图式文明”(a Platonic civilization)这个表达式来称呼尼采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旨在让柏拉图本人与“柏拉图主义”分离开来——与此相对照,海德格尔宁愿把柏拉图本人与“柏拉图主义”

① 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

绑在一起。^①显然,在朗佩特看来,尼采可没有把柏拉图本人与“柏拉图主义”绑在一起。正是基于这一点,朗佩特才能做出这样的断言:尼采反“柏拉图主义”的真实目的,其实为的是还原柏拉图的真相——这意味着还原“真正哲人”的本来面目。反过来说,“柏拉图主义”是柏拉图的伪装——必须再次强调,这个伪装是柏拉图自我伪装:

[尼采式的哲学史]在柏拉图身上还原了对所有最伟大的哲人来说最具根本性,并最终推动、鼓舞了他们的东西,其中最根本的是两种激情或爱(two passions or loves)。哲学是理性地理解整全的激情(the passion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rationally),是对智慧的爱,苏格拉底在《会饮》中表明,是对可被理解为爱欲的整全的最高爱欲,[其他任何爱欲皆]无出其右。(页13)

朗佩特把“对智慧的爱”等同于“对可被理解为爱欲的整全的最高爱欲”(the highest eros of a whole that can be understood as eros),由此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政治哲学”——所谓“政治哲学”意味着:把“整全”(the whole)甚至“智慧”(wisdom)本身理解为爱欲,以至于 philo-sophy [哲学]成了爱-爱欲本身。与此不同,形而上学则是对为什么“在”在而非不在感到好奇并要始终一探究竟的爱欲。倘若如此,我们似乎仅需要把作为整全的“在”理解为“爱欲”,就可以完成形而上学与政治哲学的转换。然而,如此转换意味着什么或结果会怎样呢?意味着或结果是:爱智慧[整全]就是“爱人类”。朗佩特在“导言”中向读者承诺,他的“下一本书将承担研究《会饮》和《斐多》的任务”,这意味着进一步深入关注“柏拉图所呈现的苏格拉底的爱人类”(philanthropy)。这听起来颇具讽刺意义,因为,在尼采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多对所谓 philanthropy [爱人类]的嘲讽、挖苦甚至痛斥。在尼采眼里,“民众的柏拉图主义”正是一种 philanthropy [爱人类]的基督教哲学。在《尼采》讲稿的“前言”中,海德格尔首先要求读者关注自己在1947年发表的《关于

^① 在《尼采》讲稿的“前言”中,海德格尔尤其提到自己在1942—1943年发表的两篇论柏拉图的作品:《柏拉图的真理学说》和《论真理的本质》(《尼采》,前揭,上册,页2)。这两篇作品的中译,见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赵卫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人道主义的书信》(《尼采》,前揭,上册,页2),我们知道,这封书信是对 philanthropy[爱人类]的哲学的贬斥:人道的哲学把人的位置摆得还不够高——朗佩特何以能够说,按照尼采的眼光,“政治哲学的历史……最终是哲学式的爱人类的历史,是从哲学的立场上进行哲学统治的历史”?

朗佩特马上为我们解惑:的确,尼采孜孜不倦地鞭挞“爱人类”的哲学……然而不能忘记,尼采也一再强调了“哲学中另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区分。在现代启蒙运动之前,所有哲人都懂得这种区分”。言下之意,尼采所说的“柏拉图主义”是“道德化”的亦即显白的柏拉图:

柏拉图的道德主义是显白的,是一种有益的教诲,必须带着怀疑地将这种教诲视为柏拉图用于教化社会、提升社会的手段,并庇护社会免于哲学的种种结论。(页14)

朗佩特力图表明,“如此道德化”的柏拉图是柏拉图有意识有目的地双重写作造成的结果。《哲学是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识读的第一篇柏拉图对话是《普罗塔戈拉》,因为,智慧者必须隐藏自己是这篇作品的“首要主题”。

普罗塔戈拉和苏格拉底都懂得,隐微术——即用有益的意见掩护不那么有益的真理——不仅是出于迫害的原因才有其必要。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归根结底,隐微术是由“城邦的根本需求”规定的。“苏格拉底式的修辞术意在成为哲学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目的在于引领潜在的哲人走向哲学——通过训练他们,以及使其摆脱阻碍哲学努力的诱惑,同时也阻止不适合学哲学的人接触哲学。”引导和阻止的双重功能使得苏格拉底的修辞术“相当公正,它的生命来自社会责任的精神”。(页14-15)

朗佩特在这里提到施特劳斯,并随之宣称:“对于一部尼采式的哲学史来说,施特劳斯几乎是个不可或缺的源泉”——这无异于告诉读者,他对尼采的理解来自施特劳斯。这让我们想起朗佩特的专著《施特劳斯与尼采》……如所周知,施特劳斯尽管把尼采视为现代性三次浪潮的最后一次,他对尼采的专门论述仅仅是一篇题为“注意尼采《善

恶的彼岸》谋篇”的论文。^①通过以施特劳斯的方式识读施特劳斯,《施特劳斯与尼采》揭示出施特劳斯与尼采的深隐渊源。朗佩特认识到尼采的双重言辞凭靠的是施特劳斯的眼力,由此可以说,朗佩特与海德格尔在尼采观上的对峙,其实是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的对峙——尽管在《施特劳斯与尼采》最后,朗佩特针对施特劳斯对尼采的批判为尼采做了辩护。在他看来,施特劳斯在把握西方文明危机时未必比尼采坚毅、坦诚甚至勇敢。首先,施特劳斯拒绝承认现代物理学的有力挑战,而在尼采看来,物理学的进展“对柏拉图的谎言是致命的”;第二,没有像尼采那样坦诚地将早就面对物理学且很好地处理了原子问题的“伊壁鸠鲁置于柏拉图之上”;第三,不像尼采那样敢于为提倡未来的宗教作出牺牲——总之,在朗佩特看来,与尼采相比,“施特劳斯在决定性的历史时刻缺乏无畏精神为哲学奋斗”(《施特劳斯与尼采》,前揭,页182-184,188,194,199)。^②但在《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中,朗佩特不再提到施特劳斯与尼采的个体差异,而是沿着施特劳斯指引的方向来理解尼采对西方文明危机的理解。朗佩特看到,尼采“在表面上”把西方文明的灾难称为“上帝已死”,实际上指的是“柏拉图主义之死”——也就是柏拉图的显白教诲之死。

在这一文化灾难中,人们究竟需要什么。人们需要的是柏拉图维度的哲学统治(philosophic rule of Platonic dimension),以及旨在打破柏拉图主义统治的反柏拉图式的意图。与此同时,要将柏拉图认为必须隐藏的东西公之于众——将所有存在物的存在方式理解为爱欲,这才是哲学的真实理解。(页16)^③

① 施特劳斯,《注意尼采〈善恶的彼岸〉谋篇》(林国荣、林国华译),见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页234-256。

② 值得思考的是,时隔十多年后,为何朗佩特写的是《哲学是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而非《哲学是如何成为伊壁鸠鲁式的》。

③ 在《施特劳斯与尼采》中,朗佩特说的是:“从尼采的观点看,施特劳斯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为其不明智的不顺从而内疚的策略家:柏拉图的两个重大的假话已经时过境迁,他还在不明智地坚持。”“从尼采关于现代的观点来看”,问题已经不是人类是否需要柏拉图式的谎言,而是“既然人类必须在没有柏拉图式的谎言的情况下活下去该做些什么。”(《施特劳斯与尼采》,前揭,页186-187)。

“所有存在物的存在方式”这样的表达式会让我们想起海德格尔的《尼采》讲课稿通篇所用的语词。由此看来,朗佩特的这段话可以说是针对海德格尔的尼采理解而说的。与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不同,朗佩特突显的是“哲人立法抱负中的柏拉图—尼采式特性”:把柏拉图和尼采视为立法者,而非形而上学家。“为了在世间维护理性的福祉而寻求统治”,柏拉图和尼采所要理解的首要事物或“所有存在物之存在方式”是“爱欲或权力意志”。这意味着:尼采的所谓“权力意志”在柏拉图笔下的名称是“爱欲”。

以上是朗佩特在“导言”中对我们公开的意图。我们难免感到困惑的是:既然尼采眼里的“民众的柏拉图主义”是一种“爱人类”的哲学,这是柏拉图的显白教诲的结果,朗佩特何以又可能说,尼采通过反“民众的柏拉图主义”要还原的柏拉图真相是“爱人类”的哲学?我们显然不能说,柏拉图的显白教诲掩护的是苏格拉底的“爱人类”的哲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朗佩特的意思是,尼采反“柏拉图主义”为的是修复“柏拉图主义”?倘若如此,这岂不与海德格尔的论断(尼采反“柏拉图主义”最终完成了“柏拉图主义”)是一回事吗?如果不是,又会是怎样的呢?

通过识读从柏拉图的36篇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三篇作品,朗佩特力图表明,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如何成为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必须注意,这里的所谓“革命性”的含义针对的是哲学或哲人族,而非世人。苏格拉底的立法首先是为哲人族立法,然后才是“为了在世间维护理性的福祉”而立法。在“结语”部分,朗佩特再次回到这个柏拉图—尼采式的哲人立法抱负问题。

正如柏拉图所表明的那样,苏格拉底正开始成为一个革命性的人物,而事实证明,他的苏格拉底的确是革命性的。柏拉图将苏格拉底呈现为“所谓的世界史的唯一转折点和漩涡”,在苏格拉底之后,“所有的神学家和哲人都走在同一条轨道上”(《善恶的彼岸》,格言285;《悲剧的诞生》,15节;《善恶的彼岸》,格言191)。尼采也说过,真正的哲人是发号施令者和立法者(《善恶的彼岸》,格言211)——而柏拉图则展现了,苏格拉底如何逐渐成为一个为哲人统治确立原则和必要性的哲人,而且他本身就体现着那些原

则,苏格拉底本人就是关于诸神本性的立法者和通过观念进行哲学统治的创建者。(页413)

“世界史的唯一转折点和漩涡”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抨击苏格拉底的话,朗佩特大胆地以柏拉图的名义颠倒了尼采这句话的痛斥含义,使之变成了对苏格拉底的颂扬。他的依据是,“启蒙运动之前的所有哲人,都清楚显白与隐微的区分”——换言之,尼采虽然生活在启蒙运动之后,他仍然信守这一古老的传统。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通过“恢复希腊智慧者们自从荷马开始就已经在实践的隐微术,而且创建了显白的柏拉图主义,以庇护和促进他真正持有的隐微哲学”(页413)。在启蒙运动之后的语境中,尼采笔下的很多说法其实是显白说辞。在启蒙运动之后,谁不懂得尼采仍然看重的隐微术,谁就不可能注意到“显白的柏拉图主义”与尼采“真正持有的隐微哲学”的关系。朗佩特由此强调了他在《施特劳斯与尼采》中展示的主题:在二十世纪的后现代或后启蒙时代,对哲学事业来说,理解“哲学隐微术”成为理解哲学史的关键。因此,施特劳斯在20世纪30年代(1938—1939年)对“古希腊作家们的隐微教诲的完整范围和特征”的“重新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史意义——那个时候,海德格尔刚刚做过标志性的《形而上学导论》讲座,提出了自己对古希腊作家的理解。事实上,施特劳斯对隐微/显白教诲的关注已经见于1930年出版的《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甚至更早的“柯亨对斯宾诺莎圣经学的分析”(1924)一文——那个时候,海德格尔正在写作《存在与时间》。^①因此我们的确断乎不能说,施特劳斯是海德格尔的弟子。海德格尔力图证明,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个问题依赖于哲人这类人如何可能。在《尼采》讲座的开场,以“作为形而上学思想家的尼采”为题,海德格尔一上来就引用了尼采在《权力意志》中的一段话:

我无意说服谁去从事哲学:因为必然地,兴许也值得想望的事情是,哲人是一种稀有植物。没有什么比塞涅卡或者西塞罗那样说教般地赞颂哲学更让我反感。哲学与美德无关。(《尼采》,前

^① 参见施特劳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李永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揭,上册,页3)

施特劳斯描述隐微教诲的基本原则和必要性同样是为了证明:哲学如何可能——这与对外关闭哲学的大门是一回事。

为了证明哲学的可能性,施特劳斯不得不揭露隐微教诲的真理。他因此在隐微术历史上导致了一场革命:多亏了他,像笔者这样的哲学劳作者才能写下例如眼前刚刚完成的注疏,这部注疏借鉴了施特劳斯的洞见,因而进入了哲人大厦的某些密室之中,倘非如此,这些密室就会是关闭的。(页414-415)

朗佩特把赞辞给了施特劳斯,而非海德格尔,理由是:

一部得到施特劳斯扶助的尼采式的哲学史,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身上发现了一种为了哲学的政治,即一种“大政治”(great politics,《善恶的彼岸》,格言208),它在其最深层的政治方面是一种神学,一种关于最高存在者的神学-政治教诲,它教导并标示出我们最值得效仿的那些对象是什么。(页415)

由此可以理解,《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出版三年之后,朗佩特在施特劳斯逝世四十周年之际出版了名为《施特劳斯的持续重要性》(*The Enduring Importance of Leo Strau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长达360页)的专著。施特劳斯让朗佩特懂得,为何“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让一位神看起来是一个超越于流变的存在者,一位道德法官”,让他得以识读柏拉图《王制》卷十中苏格拉底最后编造的命相神话与荷马的隐秘关联,能够让他“从几乎二千五百年后具有后见之明的位置回望”这样一种教诲:“这种教诲将关于‘神与人将在来世获得永恒’的谎言提升为最高的理想”。尤其是能够让他理解,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本来其实是“一种由一位哲人创立的神学政治教诲”。换言之,“大政治”的含义是,哲学的统治始终应该是秘密统治,因为这种统治看起来始终像(但也仅仅像)是宗教在统治。这意味着,哲学仍然是哲学,而非哲学变成了宗教,否则就成了哲学公开施行统治——这等于虚无主义公开施行统治。因此,尼采会说:“没有什么比塞涅卡或者西